小说写成音乐

■ 王 蒙

王蒙，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，原文化部部长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、学者。2020年出版《王蒙文集》（新版）50卷，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。2019年被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。

是把小说写成音乐呢，还是把音乐写成小说？

是一种风格？流派？歧途？小说革命？无中生有？沉迷？雷电？

我曾经在某处写过另一个地方树梢的微风，而如今却找不到通往那里的路……忽然间有一种奇怪的空间感……爱因斯坦1923年曾经在那里做过一次讲座。

是的，他写到了空间，他又写到了久远而又亲切的时间。他写到“时间的宫殿与空间的宫殿”。

而且在此后，读者们读到了对于奇怪的空间感的横空出世的新感觉主义描写以后20杂志页，约三万字以后，他又重复了这个主题词，但没有再提爱因斯坦。

无知的我只知道爱因斯坦，小说里则写得完全：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。这增加了对于世界名人的敬畏感。

对了，此西班牙作家是1961年出生的，现在他至少是63岁了。人积累了岁月和地域的记忆和想象，如果是刘慈欣，地域就包括外星球和外银河系。积累得多了，便能生产文学的反刍和慰安，感动和骄傲，文学的欣赏，旋律与节奏的温存，还有文学与艺术的较劲、咬牙。毕竟一切的往事都有它的意义与痕迹，有故事，有戏，有诗，更有不同乐器的纷繁与摇曳的乐段。

2024年1月18日，腊八，王蒙喝了包括小米、黍子、糯米、赤豆、莲子、红枣和燕麦片的粥，“谁家的烟囱先冒烟，谁家的粮食堆成尖”，八岁以前，每年的腊八都有这样的华北俚语出现在报屁股上。腊八是农家的谷神节日。我们追求深深的地气、生活与文学，我们有时也追求天风、天云、天梦、天魂；打开一扇也许等了一辈子没有能打开的门，通向更高（能不能用一个神一点的词儿？）的生活。

喜欢喝腊八粥与喜欢西洋古典音乐是两种路数，小说里与译者的前言里时有欧洲大师的作曲家姓名与器乐演奏出现，好像在音乐厅享受交响乐，在吃过红枣与麦片之后欣赏瓦格纳与舒曼。

在2024年腊八这一天读着今年首期《十月》杂志，“全球首发”（！）·中篇小说栏目中《一种更高的生活》，作者西班牙安德烈斯·伊巴涅斯，译者杨玲，一上来就打动了我，像是一块石头，扰动心头的涟漪。

杨玲在序中说，这不仅仅是小说，作者想写的是像音乐一样的小说，作者说过“想把音乐写成小说”。如果那确实是把现成的音乐作品写成小说，是以音乐为对象的小说，和写绘画写舞蹈尤其是写建筑一样，无甚新异。但像音乐一样的小说，极有吸引力，那就是把自己的小说作品写得像音乐一样动情无言，一样纯洁透明，一样震撼多姿，一样开阔无边，一样八方四面、天花乱坠；像音乐一样穿透灵魂，深入灵魂；像音乐一样成为一个世界，成为本小说的题目——“一种更高的生活”。

一种更高的生活，用中国式的修辞与造句，那就是更高的境界、追求，是的，文中的小标题出现了“生活境界”的复合词。用终极语言来说，是彼岸，是天堂，是仙界。而用文艺学美学的名词呢？就是艺术的极致、艺术的时间与空间，是诗神美神酒神的神话，就是精神的大满贯。

这里有更进一步的向往，这里有凌虚蹈空的危难，这里有自以为是的神经质，这里有曲高和寡的碰壁，这里有难以接受的困扰。

这里追问更高的生活与文学。

这里有各式象征暗喻。这里把写作夸张为刑罚，把从文视为苦行僧献身。这里把音乐写成拦路把门的警卫。这里用高傲的艺术精英主义营造孤芳自赏的空虚。

这里还不断地提出与辨析“苏联”“俄罗斯”“俄罗斯的孩子”等字样，作者是新左翼？

也很希望对译者有了解，上网一查，杨玲名下有2717张图片，有布依族的易地大城市统战部长，有龟兹壁画剪纸艺术家，有心理学教授，有星石投资总裁……你觉得杨玲这个姓名充满活力，兴旺发达，茂盛红火。

小说、作家、音乐、杨玲、安德烈斯·伊巴涅斯，都在百花齐放。甲辰大吉。

为什么现代主义文学元年是1922年

■ 丁 帆

这是2024年新年收到的第一本好书，从封面装帧到“月记体”的书写形式，再到前所未有的新颖观点，以及以事件为叙述枢纽的方法，立马吸引了我的眼球。

译者唐建清先生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，无论是文学作品的翻译，还是思想哲学类的译著，都是一流的，尤其是他能够将原著准确而深刻地译介给读者，让我们从中不仅得到审美的愉悦，而且得到极大的思想震撼。比如他翻译的奥威尔的《一九八四》、毛姆的《在中国屏风上》、纳博科夫的《独抒己见》、菲斯杰拉德的《夜色温柔》、格罗斯曼的《我心深处的文法》、冯内古特的《2081：冯内古特短篇小说全集》、格林布拉特的《大转向》、沙甘的《现代信仰的诞生》等。

这次他翻译的这本《天才群星闪耀：1922，现代主义元年》，其作者是我们并不熟悉的一个英国身兼多职的文化电影媒体人凯文·杰克逊，作者在中国无名，但是这本书的名字让我感到十分惊讶，现代主义的元年定在1922，真是有点耸人听闻，成为我阅读这本书的兴奋点；而“天才群星闪耀”的形容词让我急于看到他的天才花名册。

此书除去“导言”和“后续”，是按照1922年的每一个月为标题，我称之为“编月史”形式的创新形式，最重要的是，作者是以美国诗人庞德将1922年作为“新时代的元年”的理论为轴心问题，展开了文学和新闻“编月史”的叙写，这就像他备受诘难的《尤利西斯》一样让人费解，这个墨索里尼的崇拜者，“他是在拿《尤利西斯》作为时代终结者的特性开玩笑吗？”难道真的是《尤利西斯》推动了现代主义的历史车轮了吗？这真的是从“前现代”到“现代”的过渡年代吗？在本书的“导言”中，作者将1922年前的文学史进行了耙梳，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观念呢？——“1922年，是拥有许多了不起的第一、诞生和奠基的一年。旧世界正在消失。”“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国家正在意大利建立。”以及“苏联”的成立。所有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背景，都成为了西方现代文学元年的理由：“《尤利西斯》和《荒原》是当年杰出的文学作品，是现代主义作品的日月同辉……这群天才在之前无人知晓，此后也无人可与之匹敌。以下篇幅试图找出这些天才星座中最重要的一些星球，并说明乔伊斯和艾略特的代表作是如何在这个星系中出现的。”

无疑，这是一部十分好读的文学“编月史”，以事件发生以及生活琐事为叙述的经纬，钩织了一幅幅时代的背景画面，就像一段段新闻纪录片的蒙太奇长镜头组接，将我们带入了那个“大变局”的时代里，那些以往被人忽略了的“温水煮青蛙”岁月，一旦被无限放大为一个个“特写镜头”的时候，它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大思考的境界——当封建的农耕文明与现代的工业文明进行生死搏战的时刻，我们如何对待反反复复的文明冲突呢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们人类在进入“后现代主义”的今天时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元年的问题了，它应该是文化和文明的时代大命题了。

如果说“天才群星闪耀的1922年”是“现代主义的元年”，那么，它的终结年代在哪里呢？抑或它是否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岁月等待？

我以为，这本书是蛮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专业参考书的，因为一百年来，现代主义文学始终是一个永远难以揭开的谜团，因为我们缺少的就是历史背景的常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。

2024年1月20日10:30匆匆于南大和园

丁帆，南京大学资深教授，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文学批评学会副会长。

名家新春在读

书籍的生命是被阅读唤醒的。书像窗户，透过它，可以望得更远更高，看见更多的东西，引发沉思和遐想。阅读虽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，却能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。

立春之际，万象更新，本刊特推出新专栏“在读”，请全国多位名家学者谈谈他们正在品读的书，把他们读书的心得和快乐分享给读者，以期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，共迎一个充满希望与生机的春天。

本版制图：王梓含

正逛祝勇大花园

■ 刘心武

刘心武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。代表作有短篇小说《班主任》、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（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）、散文集《也曾隔窗窥新月》《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》《刘心武妙品红楼梦》。

我在读什么？

嘿嘿，正逛祝勇大花园哩！

是在翻阅他的“故宫系列”吗？确实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、祝勇撰写的关于故宫的著作，书架上都有，最厚的一本《故宫文物南迁》有755页。说句实话，他签赠我的“故宫系列”图书，我读都读不及，只觉得目不暇接、美不胜收，而且，他以故宫文物南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国宝》也已杀青，前几天收到了出版社递来的《国宝》试读本，上下两册。如此多产，且每部都雄浑秀美，祝勇正处在才华喷发期！

不过，像其他一些作家一样，作品层出不穷，会形成一种自我遮蔽效应，人们会只记住其中最夺人耳目的，忽略掉其他其实也非常精彩的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，近十几年来，有的年轻人见到我，就会不由得说：“啊！讲《红楼梦》的那个老头儿！”其实我的写作是种小说、散文、建筑评论、《红楼梦》研究“四棵树”，不愿意因研红的讲座书籍一度抢眼，而遮蔽住我的其他著述。同样，见祝勇名，便只呼出“故宫”，也是片面的。

又刚收到辽海出版社2024年1月第一版的祝勇著述集五卷本，一书到手，我总要先观其装帧，啊呀，这五本书好漂亮！图文并茂，倒不算稀奇，难得的是图的版式，与文贴切互补，且大方雅致。安东·契诃夫说过：“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：衣裳、面貌、心灵、思想。”书也是一样，应该一切都是美的：书衣、版式、内容、思想。这五卷分别是《月枕山河》（散文精选）、《历史的复活术》（创作谈）、《大家的大家》（访谈录）、《文学的故宫》（答问录）、《洞见故宫之美》（答问录续编）。这套书的外在视觉效果非常好，这五卷书汇合成了一个美丽的园林，是祝勇创造的又一大花园。我最近期间，会不时徜徉在这所或朗阔壮丽、或曲径通幽的园林中，获取充沛的审美愉悦。

我与祝勇交往有三十多年了，那时候我刚写过《五十自诫》，他才二十郎当岁。他那时就跟我说立志要创造出一种新散文来，不但要摆脱杨朔、秦牧那类模式，也要区别于沈从文、汪曾祺那种格局。三十多年来，他身体力行，果然以丰富的著述，趟出了一条散文新路。正如他在这套书《总序》中所说：“我的笔下不只有故宫，还试图容纳一个更加深远广袤的世界，不只有天下运势、王朝兴废这些宏大主题，更含纳了小桥流水、紫陌红尘里的日常生活，以及蕴含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乡愁。”翻阅他的文章，确实，对世界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、人性，他有鸟瞰，也有仰望，有尽收眼底，也有蹲视细微；使用望远镜，也使用显微镜，更有天文望远镜的运用；他往前检索，也朝前瞻望，他运用摇拍，也注重特写，或花团锦簇，或黑白灰三色，该艳丽艳丽，该素淡素淡，浓妆素抹总相宜，鸟鸣总在耳东西。他探究兴亡规律，更探索人性奥秘。尚未将他的花园游遍，已觉馨香沁鼻，胸臆大畅，有浮一大白之快！

祝勇是安静的。祝勇也是寂寞的。他在《总序》中说：“倏忽间，人生已过大半，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已然是‘尘满面，鬓如霜’了。我没写下什么了不起的作品，只是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写作。蓦然回首，我不知道算是成功还是失败。或许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成功与失败，只有选择的不同而已。人的一生不可能面面俱到，一种成功可能就意味着另一种失败，反过来，一种失败也暗藏着另一种成功。我选择了在写作中度过此生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我都无怨无悔。”这是富有诗意的顿悟。通透而澄明。

我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一些诗句，但我实在不具备博学强记的能力，不可能凭记忆完整引出，这也是我在书房中阅读的习惯，就是正读一本书，忽然联想到另一本书，于是立即从书架上找出那本书，合璧阅读。我找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杨德豫的译本，我根据脑海中浮现的断句，检索出这样一些诗句：“不要在哀伤的诗句里对我说，人生不过是一场幻梦！/……我们命定的目标和道路/不是享乐，也不是受苦/而是行动，在每个明天/都比今天前进一步。/……伟人的生平昭示我们：/我们能够生活得高尚，/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，/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；/……那末，让我们起来干吧，/对任何命运抱英雄气概；/不断地进取，不断地追求，/要学会劳动，学会等待。”（《人生礼赞》）“不屈不挠的意志的星，/从我的胸臆中上升，/清澈，雍容，沉默，/安详而又恬静。/……当你的希望一个个落空，/你也要坚定，要沉着！/在这样的世界里不能畏怯，/不久你就会知道：/受苦而又坚强，/那是何等高尚！”（《星光》）“我觉察出，/无端虚掷了多少时光；/美好的意愿如同一支箭/中途落下，或飞向一旁。/可是谁敢/用这种方法来衡量得失？/失败可能是变相的胜利；/最低潮就是最高潮的开始。”（《得失》）我又特别找到《乡下铁匠》：“额上淌的是老实人的汗水，/他取得能够得到的报偿，/他敢睁大眼睛来看全世界，/因为他不欠任何人的账。/……劳苦，——快乐，——悲伤，/他行进在人生的路上；/每个早晨看见他开始干活，/每个黄昏看见他收场；/有些工作起了头，有些干完了，/挣来一夜的酣畅……谢谢你，我可敬的朋友，/谢谢你的教益和榜样！/在人生的熊熊炉火里，/我们的命运也要经过锤炼；/在那轰鸣的大铁砧上，铸成了/火花四射的事业和思想。”

我从祝勇花园，又穿越到大约二百年前美国朗费罗的花园，这就是我的“在读”状况。我心中漾着甜蜜的波纹。在朗费罗之前，到朗费罗，到我，到祝勇，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跟进者，作为一个“乡村铁匠”，因爱好而写作，而孜孜不倦地营造出自己的文学花园，不问得失，不求闻达。又忽然想到《红楼梦》里曹雪芹为林黛玉造出的六字名句：“我是为我的心。”美好的一天，眼前有书，有古人、今人营造的文字园林，这徜徉的快乐，怎一个“爽”字了得！

2024年1月19日 绿叶居中

纪晓岚在乌鲁木齐长学问

■ 罗 新

罗新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。

最近重读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纪晓岚一生仕途最大的挫折在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，因向卷入两淮盐政亏空案的姻亲卢见曾（纪晓岚长女婿卢荫文的祖父）通风报信，被贬戍乌鲁木齐，乾隆三十六年夏才回北京，滞留乌鲁木齐长达三年，可能是近千年间中原顶级文人最早有长期西域生活经验的。这一出乎意料的经历对他的学识一定有不小的影响，他晚年所著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多记西域闻见，固有不脱旧习道听途说者，但也有几条笔记说明，乌鲁木齐的独特阅历让他的识见大有长进。

虽然在纪晓岚西戍之前五年，乌鲁木齐已更名迪化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坚持称乌鲁木齐，大概不是反对乾隆的西域政策，而是因为这个名字比较有异域风味。而他对往日所读野史笔记有关西域的种种异闻，终于有了一验虚实的机会。比如，唐代冯翊子《桂苑丛谈》记“太尉朱崖公”（李德裕）第一次从浙西观察使卸任时，向甘露寺老僧院公告辞，奉上自己宝爱的筇竹杖作为赠别之物。这根竹杖“虽竹而方，所持向上，节眼须牙，四面对出，天生可爱”，是用比较罕见的方竹所制。几年后李德裕再任旧职，又到甘露寺游玩，“问前时柱杖何在”，老僧答“至今宝之”，取出一看，“则老僧规圆而漆之矣”，已经削磨上漆，成了一根常见的圆竹杖了。李德裕震惊于老僧之不识货，不由大悔，说这根方竹杖“是大宛国人所遗竹，唯此一茎而方者也”，强调方竹出自西域（中亚），一丛竹子中只有这一根是方的。对这条记事，纪晓岚之前可能本已疑惑，因为他早知“方竹今闽粤多有，不为异物”，而对李德裕的方竹杖出自大宛，他还是不敢质疑的。有了西域三年的亲身经验，他很干脆地说，大宛就是如今的哈萨克，“已隶职方（意思是已归入清朝版图），其地从不产竹，乌有所谓方者哉”。若没有实地经验，他是不可能断言西域“从不产竹”的。

又比如，西晋崔豹《古今注》记乌孙国有一种果树，所结果实名为“青田核”，不知树生得什么样，传到中原的只是果实的核，而这个核很大，“大如六升斛”，人们用来盛水，没多久水会发酵，“有酒味出，如醇美好酒”，这种酒就叫“青田酒”。有了西域经历的纪晓岚说，乌孙就是今天的伊犁将军驻地，遍询当地的蒙古人（额鲁特），“皆云无此”，一下子就把青田核的真实性给否定了。古人笔录奇闻异事，多非目见身历，或不免张冠李戴（比如《古今注》这一条可能是把交州的椰子误植到西域了），后人只有依靠自身经验才能一一祛魅。

唐代苏鹗《杜阳杂编》记元结晚年在私宅造了一所极为奢华的房子，名为芸辉堂，饰以各种奇丽罕见之物，“精巧之妙，殆非人工所及”，“拟于帝王之家”。堂以芸辉为名，因为芸辉是一种珍贵的香草，“其香洁白如玉，入土不朽烂”，把这种结实又好看的香草捣碎成为粉末，涂在墙壁上，类似古人用椒粉涂墙，只是更加美观。《杜阳杂编》说，这种奇妙的芸辉草“出于阗国”。纪晓岚说，唐之于阗，即今之和阗，早在清朝版图内，人来人往，信息畅通，可是“亦未闻此物”，没听说那里有《杜阳杂编》所描述的这种香草。那么，西域是不是有某种接近芸辉的香草呢？纪晓岚打听到西域有一种玛努草，根部有点像苍术，藏传佛教的喇嘛们喜欢在佛像前焚烧玛努草的根部（也许是因为烧起来会有香味）。可是，玛努草的根并不白，更不能捣碎了涂在墙壁上，可以肯定不是元结盖房子用的那种芸辉草。由此，纪晓岚也就否定了《杜阳杂编》所记于阗国芸辉草的存在。

《文献形役录》

■ 韦 力

本书作者吴格先生为当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，该书乃是他学术成果的结集。本书不分卷次，内容大致分为四大部分，分别是对《四库全书》提要稿的研究、嘉业堂等著名藏书楼目录述评、近年出版之目录学成果之总结，以及王大隆等目录学家传记。

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正式设立，至乾隆五十二年江浙三阁本《四库全书》缮写完成，这项文化大工程前后历时十余年，总计整理图书逾两万种，撰写提要一万一千余种，基本涵盖了先秦以来至乾隆年间中国传统典籍之精华。自乾隆以降，有无数学者对《四库提要》进行辨证、考订、增补和续编，形成一门显学。

《四库提要》的撰写过程大致是先由各纂修官分工撰写初稿，经总裁批阅，发纂修官改写重撰，最终由总裁官纪昀等修订成稿。《四库提要》由分纂稿至最终定稿付梓，前后历时二十余年，几经修改，形成多个版本，只有系统地考察成书过程，才能了解到学术思想的变化。如今《四库提要》的分纂稿大多已失传，流传至今者仅一千一百余篇，这些提要稿可以确定的作者有九人，另外还有佚名分纂稿。吴格对现存稿进行系统研究，从中探索当年四库馆的图书审查标准、收书标准、修订改写原由及方式，以及禁毁书等问题，从而拓宽了四库研究的领域。

嘉业堂为中国近代规模和体量最大的藏书楼，通过研究《嘉业堂藏书志》可了解到该楼藏有哪些善本，这些善本有什么特别之处。1982年，该书稿本售归复旦大学图书馆，吴格对此稿做了系统研究，从中整理出《藏书志》是由哪些名家以递修式撰写，每位撰写的成稿有哪些优劣点。同时吴格又为嘉业堂主人刘承幹的《求恕斋日记》作了影印前言，并整理出版《嘉业堂访书记》，此记是从已故文献大家王欣夫先生的《学礼斋日记》稿中辑出，而吴格对王欣夫也做过系统研究，他从欣夫先生的日记中还整理出篆刻名家王冰铁的事迹。本书中同时收有吴先生撰写的《吴县王大隆先生传略》以及《王欣夫致王献唐书札小笺》等等，可见吴先生围绕版本目录学展开了多个角度的系统研究，这种治学方式最令人敬仰。

韦力，爱书人，研究方向：目录版本、书史、儒学、历史遗迹寻踪。